

社會階級、家庭結構與青少年偷竊行為的關係：

一個美國社區的實證研究

□周憐嫻□

摘要

本研究以青少年的社會階級與家庭生活方式之間的互動關係出發，想求證偷竊行為是否為此互動關係的產物。研究之理論架構綜合了犯罪學之權力控制理論以及差別機會理論的看法，提出一項假設，即父母對孩子缺乏管教，孩子擁有過人的經濟資源，又嚐試過權力的滋味，再加上富有高度冒險性格，其行為較具有自由度，脫離正常道德規範與法律而走向偷竊之路的可能性也愈高。根據分析結果顯示此假設較為適用於解釋中間階級以及上層階級青少年的偷竊行為模式。尤其是出身中上階級家庭之青少年若具有較大的合法機會結構以及對可能遭到處罰的後果輕視不在乎，那麼其發生偷竊行為的機率又更高。

前言

青少年的偷竊行為不僅在臺灣是大人頭痛的問題，在美國也是一樣的令所有的司法官員、商家與家長傷神。在美國社會青少年偷竊行為發生的機率遙遙領先其他型態的偏差行為，但社會的關注程度以及學界的研究興趣卻遠低於如青少年暴力、或吸毒等行為。在有限的經驗研究參考資料中，學者又多選擇以成人的偷竊行為或偷竊者的個人特質為研究主題，對於青少年的偷竊行為或偷竊行為本身的描述則付之闕如。八〇年代以來學者發表了兩篇有關青少年偷竊行為的重要論述 (Klemke, 1982; Fox, 1990)，但是兩篇研究皆非以犯罪學理論的觀點出發，且忽略了探討青少年的家庭結構與偷竊行為之間的關係。

因為前人相關研究不足，所以本文企圖就此問題做一分析討

論。我們在此的研究對象雖以美國的青少年為主，但同樣的理論架構也可供國內的學者參考，尤其是台灣社會階層化愈來愈明顯的現在，青少年的各種行為如何受到家庭階級的影響，將是學者未來必然會面臨的重要研究課題。對於有興趣於中美家庭結構與青少年問題特質差異之比較研究的學者而言，本文的論證結果也可助掙脫外國資料不易取得的研究困境。

本研究以青少年的社會階級與家庭生活方式之間的互動關係出發，想求證偷竊行為是否為此互動關係的產物。首先，在理論上，作者認為青少年的偷竊行為與家庭社會階級之間具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我們認為各種階級的家庭在社會化以及管教子女的方法上具有顯著的差別，所以不同階級出身的青少年便會表現出不同行為取向，這些充滿變化的行為模式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非法的。但不論是合法的行為或非法的行為，階級均會展現令人難以忘懷的影響力與滲透力。

其次，在方法上，若欲證明上述假設，研究者必須將社會階級這一變數以類別尺度個別分析，而非傳統上學者們慣用的連續尺度分析。同時，本研究也設計了數項與家庭階級有關的中介變數，這些變數扮演了將家庭階級的影響力深化進家庭成員的觸媒角色。以下我們將根據這些觀點，分別說明之。

偷竊行為的嚴重程度與危害性

本文選擇青少年偷竊行為做為研究主題的原因有兩層：一方面偷竊行為的本質與其他犯罪或偏差行為不同。從受害對象來看，偷竊行為並不會造成人身傷害，但是從財物損失來看，偷竊、商店內順手牽羊、汽車竊盜等三項行為每年所造成的鉅額財物損失，則居所有犯罪行為之冠。從以前的統計資料顯示，這三種犯罪行為中，青少年犯所佔的比例頗為驚人 (Griffin, 1978; Deng and Jou, 1991; Shave, 1978)。譬如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的報告，在所有被捕的汽車竊盜犯中，超過百分之五十是未滿十八歲的青少年，而十六歲又居所有年齡層的第一位，可惜的是這樣的特性並未引起學者進一步探討的興趣。

就另一方面而言，偷竊行為和部分其他型態的青少年偏差行為也有相似之處，譬如吸毒行為、破壞公物等，這些行為本身都會帶來一種令人興奮的、好玩的、有權力的感覺，而且只要一個人有勇氣去做，並不需要任何特殊技能的輔助便可完成 (Katz, 1991)。因為偷竊行為有這樣的特性，特別容易吸引一些不會傷人，但又喜歡冒險，且不怕東窗事發後可能遭致處罰後果的青少年勇於嘗試。具有這些特徵的青少年似乎頗為符合一般中上階級家庭管教子女的氣氛，因此社會階級與青少年偷竊行為之間的關係值得令人再三深思。

在所有的犯罪學理論中，我們選擇了最能詮釋中上階級青少年偷竊行為動機的權力控制理論 (power-control theory) 做為論述的主軸。根據權力控制理論的假設，權力的擁有加之以控制的缺乏會

創造一種自由的氛圍，易使青少年的行為脫離道德與法律上的束縛，進而產生各種形式的偏差行為(Hagan, Gills and Simpson, 1988)。中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少年若從事偏差行為，容易被其受過較高教育的白領家長所原諒或保護，因此，較不受正式以及非正式社會控制的約束，同時家庭中父母鼓勵的創造思考與自動自發性，也會在長久的社會化下產生子女較具冒險犯難的性格。但是要注意的，是權力控制理論學者通常僅止於一般性的論述，並未特地将焦點放在青少年身上，所以本研究的目的，是測試此理論在解釋青少年偷竊行為的有效性。

社會階級與偷竊行為

犯罪學家一直對社會階級與青少年犯罪或偏差行為之間的關係保持高度的興趣，其中有些學者堅定的認為犯罪行為是有階級性差異的(Bonger, 1969)。這些學者主張一個人的社會階級通常會影響此人所選擇之偏差行為的類型。美國學者Chambliss 就會經直言不諱的指出，「犯罪活動可以直接反射出一個人的社會階級。」(Chambliss, 1975)他認為每一個人都位居一個特定的社會位置，當遭遇疑難問題時，他就會很自然地依照自己社會位置上養成的思考邏輯來選擇解決方法。換句話說，此人的解決辦法也會帶有此人階級的特點與味道，根據此論而類推，社會階級無疑地對青少年所選擇的偏差行為類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更有些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偷竊者常有集中於某些特定階級人士的趨勢，舉例而言，商店裡順手牽羊者常見於中產階級更勝於其他階級(Abelson, 1988; Cameron, 1964)。在學者Cameron 的研究中也發現，許多被起訴的順手牽羊者中，有一大部分為中產階級婦女。有一項在華盛頓特區進行的研究發現，將近百分之七十被起訴的順手牽羊者中都是出身中上階級人士(Metropolitan Washington Board of Trade, 1978)。可惜的是這些研究多半以成人為研究對象，非以青少年為主要訴求，而且這些研究並未深入討論社會階級、家庭結構與偷竊者之間的關係。

社會階級的差異會產生不同的家庭互動關係，進而決定一個家庭的生活方式。各種家庭階級也會有不同的管教子女方法、差別性的機會結構、子女的冒險性格以及對處罰持有的態度也會因之而不同。此中的原因，就權力控制理論的角度來看，不論擁有權力或是缺乏控制，兩者均會創造出一個想要從事偏差行為的自由氣氛。而當行為自由度加大之時，走向偏差的路也會愈寬廣。權力控制理論同時也提出選擇某些偏差行為的深層意義，其實受制於個人社會階級與其行為自由度間正比關係的制約關係(Hagan and Kay, 1990)。換言之，一個人的社會階級愈高，其行為自由度也愈大，選擇某種型態偏差行為的可能性自然愈大。此外，著名的學者Sorokin 以及Lundén(1959)也會經提出過類似的主張，他們認為擁有權力會使得一個人認為自己可以為所欲為，社會道德或是法律均不再適用於自己。同理，社會學兼犯罪學者Matza 與Skyles(1961)也認

為，社會裡的有閒階級身上總是具有冒險性格，且不遺餘力的鼓吹這種性格，並對這種性格賦予高度的評價。

權力控制理論學者對權力的定義也展現他們不同的看法。此論學者將促使偏差行為發生的家庭權力分為兩種：一種是父母的職位會影響其在家中對子女所實施的管教方式；另一種則是父母在家中管教子女時，是否將這些權力具體的使用在管教子女上(Hagan and Kay, 1990:393)。本研究根據此論提出一項論點，父母對孩子缺乏管教，孩子擁有過人的經濟資源，又嚐試過權力的滋味，再加上富有高度冒險性格，其行為較具有自由度，脫離正常道德規範與法律而走向偏差之路的可能性也愈高。而上述的各項變數正好介於青少年出身的社會階級與其偷竊行為之間，擔任觸媒的角色(Hagan and Kay, 1990)。

除了權力控制理論之外，本文也試圖整合犯罪學的經典理論——差別機會理論的看法，將各社會階級所擁有犯罪或偏差行為產生的機會做一區分。學者Cloward和Ohlin(1960)就曾經提出一個看法，他們認為青少年選擇從事偏差行為，必須是在缺乏合法機會以及非法機會適時出現之際。對這兩位學者而言，他們的假設又特別適用於出身下層階級家庭的青少年。但是本文則試圖以另一個觀點出發，重新評價差別機會理論的意義。

本研究認為中上階級出身的青少年因為具有比別人更多的合法機會，反而會對這些青少年造成較大的壓力以及生活無聊的感覺，綜合青少年多變狂飆的特性，必須尋求發洩壓力與無聊感的出路以及

家庭中較為鬆弛的管教態度，使得青少年喜歡朝向與常軌相反的方向行事舉止，在所有偏差行為中這些來自中上階級家庭的青少年又特別偏愛更為刺激和危險的偏差行為。這樣的說法雖然未完全符合Cloward及Ohlin的差別機會理論，但也有學者支持本文的假設。學者Richard(1980)曾經在他的文章中提出類似的看法。也就是說，來自中上階級家庭的青少年具有比別的階級的孩子更大的自由度來決定自己的行為，並且前者擁有更多的合法機會，只會造成這些青少年的無聊感以及父母過度殷切期望的壓力。

無論如何，本文雖對合法機會結構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係提出了與其他學者不同的假設，但在非法機會結構與青少年偏差行為的關係上，作者也同意Cloward與Ohlin的看法。也就是說，不論是那一種階級的家庭均不會喜歡子女接觸任何非法機會。因此當非法機會增加時，本文認為無分階級皆會導致較高的偏差行為發生率。

研究假設

本研究的主要假設是中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少年涉及偷竊行為的機率較其他階級的同齡青少年為高。除了出身階級可能對個人解決問題的方法產生影響之外，家庭階級還可能經由社會化以及結構因素與青少年的偷竊行為發生密切關係。

本文結合了權力控制理論和差別機會理論，另外提出了三組介於階級與偷竊行為之間的觸媒，分別是家庭裡父母的管教方式、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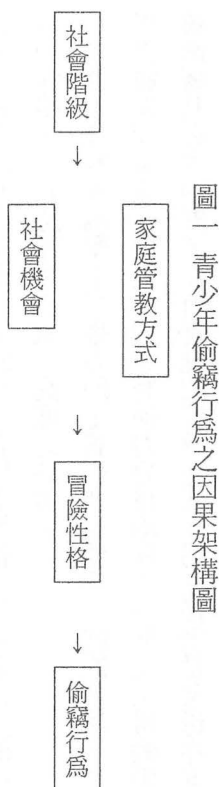
庭階級所提供的結構性合法與非法機會，以及綜合了上述社會化和結構因素所養成之青少年的冒險性格和對處罰的態度。基本上，我們認為社會階級會造成以上三組中介變數的差異，進而對青少年的偷竊行為產生各種程度不同的影響。因此主要假設之下，又可以建立三項有關的次級假設：

第一項，若父母對青少年疏於管教，青少年就愈容易利用其家庭的權力以及資源從事偷竊行為。

第二項，擁有較多合法機會的青少年也許會經歷較大的成功壓力，以及生活上的無聊感，因此富有高度刺激性與挑戰性的偷竊行為便成為這些青少年的最愛之一。另一方面，擁有較多損友的青少年，若再加上手中頗多的社會資源，很容易形成一個犯罪的情境，時時都在觸發偏差行為的產生。

第三項，青少年若給予冒險性格高度的評價，或對處罰以及從事偏差行為持有輕視不在乎的態度，下手偷竊的決定便不會有太多的遲疑。

根據本研究的各項假設，我們可以下圖簡單的摘要上面的論述：



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資料來自美國紐約州近郊一地區的中學生自陳性問卷調查報告(Singer, Levine and Jou, 1991)。這個城市充滿了許多新的房屋住宅，平均的房價是十萬三千美元左右。一九八〇年時，百分之三五的居民具有大專以上的教育程度，百分之四〇的勞動力屬於經理及專業人員，百分之三四的勞動人口從事銷售與行政工作。此城之中有百分之五的失業人口，另外百分之三弱的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之下。整體而言，此城是一個中產階級居多數的城市，頗能代表美國典型的郊區市鎮生活型態。

在獲得了此城教育局的協助之後，我們取得了整個城市中學生的名單及地址。在選取樣本時，我們採用公立中學與私立中學的學生分開抽樣的原則。公立學校學生的問卷施測是在各個學校禮堂或教室內進行，至於私立學校學生則在各區的社區青年活動中心內進行。每名參與問卷的學生均在事後給予小額的禮券作為回報。同時在對學生進行問卷施測之前，也都事先徵求了家長的同意並出具同意函。不論是私立中學或公立中學的青少年都以團體作答的方式進行問卷填寫，研究者並在測驗之前給予充分的答題說明與解釋。

在所有的中學生名單裡，我們首先以隨機取樣的方式，抽出了九三〇名公立學校的學生以及四四九名私立學校的學生，前者有六二九位，後者有一三六位家長回函同意其子女參與與我們的研究。因

此之故，我們的總樣本數為八六五名學生。最後的調查結果共回收五二四份公立學校學生之問卷以及一一四份私立學校學生問卷。公立學校學生的回收率略有差別，顯出在學校內施測較容易獲得學生的配合，完成問卷調查的比例較高。若改在社區青年活動中心進行問卷調查，有的學生因無交通工具或成人無閒陪同前來，故參與的意願較低，回收率也相對較低。

測量變數

首先，在測量本研究的主要議題之一「社會階級」時，作者採用了學者Hagan等人（1985）的定義，也就是強調以權力擁有為核心的階級觀。和Hagan一樣，作者認為權力是由一種領導與服從所建立起來的互動關係，而產生這種關係的動力則是來自對生產工具的控制權。一個人的階級建立在其擁有的權力之上，而權力的來源又有三種：第一是對生產工具的控制權；第二是對生產過程中，對其他人的控制權；第三是個人與勞動力的關係。在我們的研究裡，均將這三種標準轉換為具體的階級分類。換言之，我們認為所謂的上層階級應定位在凡是為自己事業工作且雇用了其他人替自己工作的雇主人士；至於中間階級則是那些為別人的事業打拼但在工作職位上也負有監督或控制別人的人；最後，凡是受雇於別人的事業且必須聽命行事的人以及無業者在我們的研究中，皆將其分類為所謂的下層階級。

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忽略社會學傳統對經濟條件決定階級的看法。在衡量青少年的家庭經濟條件時，我們以社會資源來表示，並以兩項具體而客觀的指標代表：第一是家庭的年收入，另外則是家庭住宅的估計價格。這兩項指標不但指出了青少年家庭經濟條件的優劣，並可顯出青少年手中可運用的經濟資源之多寡，家庭年收入較高再加上住宅市價較高，可以推斷青少年來自一個富裕的家庭，平常可以運用的經濟資源也會較來自其他家庭的同儕多。

在家庭年收入方面，本文將之分為七個選項從最低的一萬美元以下到最高超過十萬美元以上。至於家庭住宅的房價估計，則以該城在一九九〇年住宅普查局出版的家戶不動產估價報告表為標準，對照受測青少年地址後以實價登錄，在統計分析時採用以十為底數的對數值計算，以減小與其他變數數目之間的相對差距。

根據以上的討論，本文發展的家庭階級觀已經兼容並蓄的把新馬克思主義以權力定義階級的看法和功能論注重經濟客觀條件的論述融為一體。我們相信青少年的父母親若擁有事業所有權，在職位上可以對其他人發號施令，再加上高年收入並在擁有價格頗高的住屋，基本上在主、客觀上均可以被視為社會裡居高位的一個族群，我們可以姑且稱之為「上層階級」。其他的階級也可以相同的邏輯推論之。

在家庭管教面上，我們又將之分為兩種不同的層面來測量。第一層是測量親子感情關係的內在控制程度，第二層則是測量以家規寬嚴為主的外在控制程度。根據前者設計出來的問題有兩個，分別

是：「您會與父母討論自己的私人問題嗎？」答案1代表「從來不會」，4則代表「常常會」；以及「您以後想不想變成和您的父母一樣的人？」，1代表「不想」，5則代表「非常想」。在外在家庭控制方面，也有兩個相關的問題請青少年學生作答。其一是「當您不在家時，父母親不知道您在那裡？」，另一則是「當您不在家時，父母親不知道您和誰在一起？」答案從1到4，分別表示「從來不知道」一直到「一定知道」。

有關不同家庭階級提供給青少年不同的合法與非法機會的測量上，前者我們以兩個問題，詢問青少年對學校成績的重視以及對未來前途的把握，分別是「在學校名列前茅，對您而言是不是很重要？」以及「上大學並找到一個好工作，對您而言是不是很重要？」答案則從「不是」到「絕對是」分為五等級。

至於非法機會的測量問題，我們則詢問了青少年結交的朋友性質。第一個問題是「您的好朋友中，有多少曾經遭遇過警察的逮捕？」答案分別是1「從來沒有」到5「大部分都有這種經驗」。第二個問題是「您的朋友很少不惹麻煩的？」答案從1列序到5，分別代表非常贊成到非常不贊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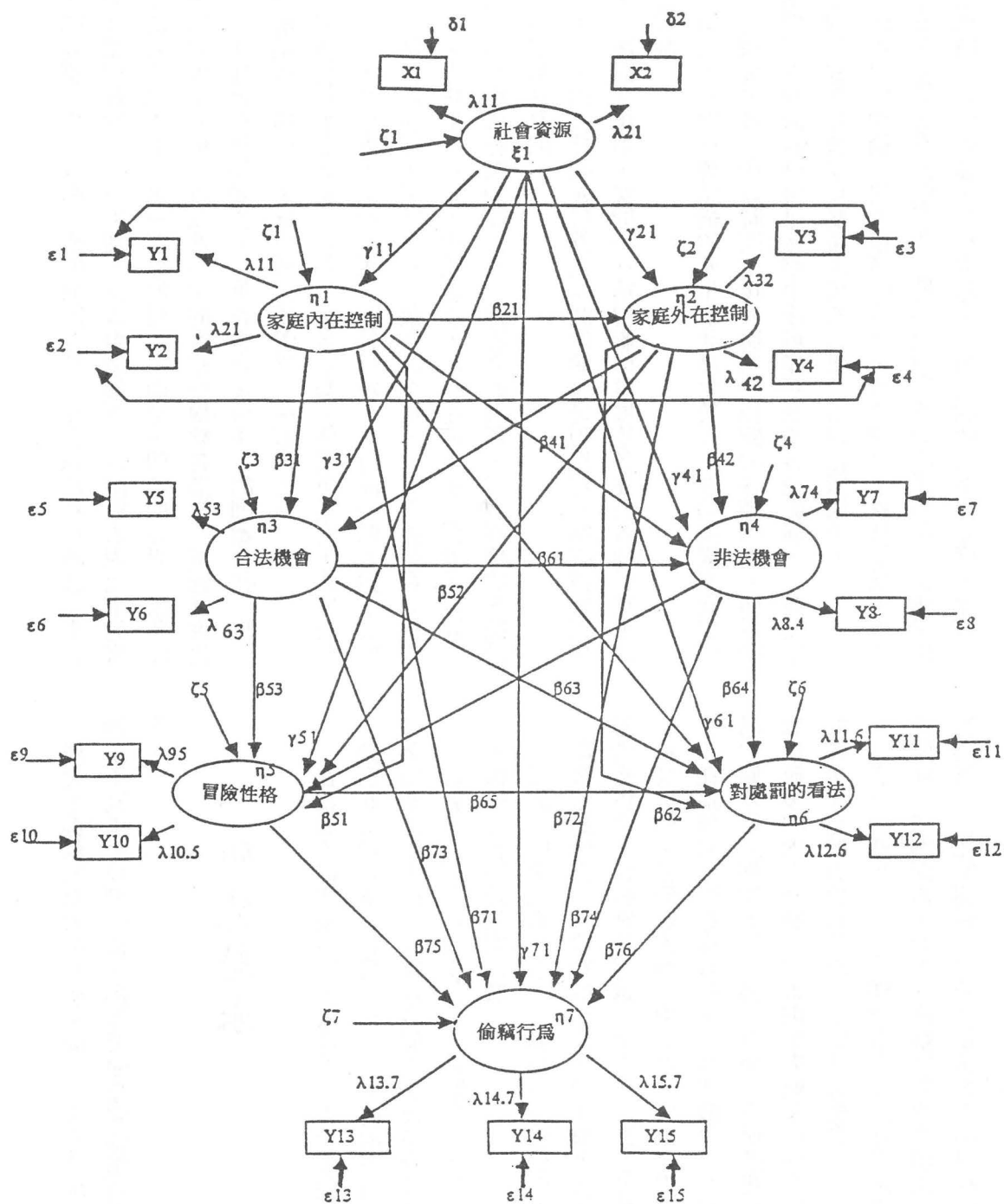
在測量青少年的冒險性格時，我們也用了兩個問題來判斷青少年。一是「我最喜歡做危險的事。」另一個是「我很喜歡冒險。」同時請青少年回答是否贊成上述說法，答案有五個等級，1是「非常贊成」，5是「非常不贊成」。

最後一項測量項目是青少年對來自父母以及法律處罰的看法。

有關來自父母處罰的看法，我們以「如果您在商店順手牽羊被抓到了，父母會不會因而處罰您？」和「如果您到別人家裡偷東西被抓到了，父母會不會因而處罰您？」兩題來判斷。同樣的，當問及青少年對法律處罰的看法時，我們也以兩題類似的題目來測量，分別是「如果您在商店裡順手牽羊被抓到了，您覺得法院會不會因此而處罰您？」以及「如果您到別人家裡偷東西被抓到了，您覺得法院會不會因此而處罰您？」答案從1「一定會」到5「一定不會」共分為五等級。

本研究的應變數(exogenous variable)是青少年的實際偷竊行為。我們分別以不同錢數來測量這項青少年偏差行為。首先是問學生「在過去的一年內，您偷過幾次價值美金五元以下（約合台幣三百元左右）的東西？」，接著又問「在過去一年內，您偷過幾次價值美金五到五十元（約合台幣三千元左右）的東西？」，最後則問「在過去一年內，您偷過幾次價值美金五十元以上的東西？」。答案是開放性的。從零次到無數次，以青少年實際回答次數登錄。

綜合以上各變數測量方法的說明，我們可以將圖一的研究架構圖再加以擴充。圖二是詳細的圖表。此圖顯示本研究中有七個在橢圓形框內的隱藏變項(endogenous variables)，分別是家庭對子女的內在控制，家庭對子女的外在控制，合法機會結構，非法的機會結構，冒險性格，個人對處罰的看法，以及青少年實際有過的偷竊行為。至於社會階級部分，我們將分別以上層階級家庭，中間階級家庭以及下層階級家庭等三個模型分析其內在家庭動力如何影響



圖二 分析架構圖

孩子的偷竊行為。分開分析的原因在於，作者認為社會階級不應以一個連續變數的方式來處理，在實際情形下，各階級表現出來的家庭生活方式基本上不是一個量的變化，而是一個質的差異。因此使用分開的模型分析，可以進一步的得知與檢驗各階級在家庭社會化以及家庭社會結構等變數，在重新組合後所產生的細緻變化，也才能瞭解階級所造成的家庭生活方式差異的深層意義。

至於各變數間的順序排列，也代表了我們事件因果關係的假設。首先，家庭內不論是父親或者是母親，來自同一個人對子女的外在控制與內在控制通常會有一致性的作法，但父親與母親的管教方式則未必會是一致的，因此之故，我們在模型中，假設來自同一個人的內在與外在控制間具有一定程度的關係，這個關係的參數是開放且必須估計的。

第二，內在控制先於外在控制的順序是因為親子間的情感與生俱來，所以父母對子女的內在情感聯繫發展應該先於各種行為上的外在管制。

第三，差別機會結構的產生應該發生於孩子開始接觸家庭以外的社會環境之後，所以時間上後於與家庭相關的各種因素。而冒險性格與個人如何看待自己做錯事後可能受到的各種處罰，一般而言是受到家庭與社會環境雙重影響的結果，所以位置居後。

因為研究架構與研究模型的特性，我們選擇了線性結構方程式(LISREL)作為分析的方法。此法最吸引我們的優點是，當測量指標增加時，其能辨識各指標與隱藏變項之間的信度與效度，並減少

可能發生偏誤的參數估計值。而且，線性結構方程式還可以測試並控制不同階級模型內部，因隱藏變項關係組合不同所產生的各種變化。

研究結果

在我們的研究模型中，對權力與青少年偏差行為之間的關係會受到家庭階級結構的影響提出了很明確的主張。所以我們的分析也循著這個邏輯進行，分別以各個階級模型分析結果一一說明。

首先，我們先觀察各項測量問題以及青少年偷竊行為的平均值、標準差和積差相關係數。

從表一的平均數來看，在偷竊不同價值財物的數值上，來自中上階級家庭的青少年偷竊的金額小於下層階級青少年。相反的，下層階級青少年比較常偷超過美金五十元以上等較大價值的財物。至於在其他的中介變數方面，中上階級父母對青少年的控制較多，青少年在這種家庭裡也擁有較多的合法機會，並認為父母可能會對自己的偏差行為施加處罰。另一方面，下層階級母親對青少年子女施以比較多的內在控制，父親則給與較多的外在控制，這樣家庭出身的青少年也較有機會接近非法的社會機會。

表一的初步結果並未顯出青少年之社會階級與偷竊行為具有線性關係。舉例而言，若不管偷竊財物的價值大小，那麼階級與偷竊行為就具正比的關係。但若就價值較大的財物而言，階級與偷竊行

表一 總樣本以及來自各階級家庭青少年在各變項上的平均數與標準差

隱藏變項	測量變數	總樣本 (N=447)	下層階級 (N=90)	家庭階級 中間階級 (N=242)	上層階級 (N=115)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家庭經濟資源	X1家庭年收入	4.54	3.51	4.68	5.06
		1.43	0.93	1.26	1.68
	X2住宅房價	5.11	5.03	5.10	5.14
		0.17	0.12	0.14	0.20
父母內在控制	Y1母親內在控制	5.59	5.76	5.63	5.50
		2.14	2.07	2.13	2.13
	Y2父親內在控制	5.03	4.66	5.06	5.13
		2.17	2.19	2.08	2.24
父母外在控制	Y3母親外在控制	5.93	6.06	5.81	6.00
		1.21	1.23	1.20	1.24
	Y4父親外在控制	5.05	5.25	4.96	5.09
		1.44	1.65	1.32	1.35
合法機會結構	Y5學校成績	8.29	8.08	8.26	8.20
		1.73	1.78	1.82	1.66
	Y6未來展望	8.99	8.86	9.02	8.95
		1.35	1.37	1.38	1.33
非法機會結構	Y7損友	2.53	2.66	2.52	2.53
		1.05	1.13	1.04	1.11
	Y8朋友曾遭警逮捕	1.82	1.85	1.84	2.02
		1.03	1.13	1.04	1.13
冒險性格	Y9喜做危險之事	2.48	2.69	2.51	2.37
		0.98	1.03	0.95	0.99
	Y10性喜冒險	3.52	3.60	3.49	3.56
		0.96	0.93	0.92	0.98
對處罰的態度	Y11父母的處罰	8.65	8.05	8.46	8.41
		2.08	2.15	2.04	1.91
	Y12法院的處罰	7.94	7.83	8.15	7.78
		2.04	2.03	1.91	2.11
偷竊行為	Y13少於美金五元	1.46	0.95	1.35	2.55
		7.99	1.75	4.42	14.94
	Y14美金五至五十元	0.67	0.42	0.53	1.99
		6.52	1.55	3.13	14.58
	Y15美金五十元以上	0.22	0.75	0.10	0.31
		2.49	6.37	0.47	1.37

爲反而形成了反比關係。反過來從階級內部的差異來分析，上層階級出身的青少年在偷竊價值美金五十元的小額財物行爲上，表現出了頗大的變異性。上層階級青少年在這項問題的標準差上超過下層階級青少年同一問題的九倍。這項證據指出了階級內部也可能有差距甚大的社會化與家庭結構組合。

在其他測量變數的平均值方面，家庭年收入與住宅市價顯然與青少年的家庭階級具有密切的關係，家庭階級愈高，其年收入愈高，住宅市價也愈高。此外，我們發現上層階級家庭之青少年所擁有的經濟資源變異最大（標準差分別爲1.68與.20）。這項證據顯示同一階級內所擁有的經濟資源未必是一樣的，這種情形又以上層階級家庭更爲嚴重。

另一個相似的觀點是觀察社會階級與各個測量變數間的相關程度。表二就是皮爾森相關係數，分別是社會階級與家庭控制、與差別機會結構、與冒險性格、以及與對處罰態度的關係。

表二顯示根據權力控制理論定義下的家庭階級分類，我們的資料的確指出青少年偷竊行爲與階級不具有顯著的線性關係，傳統犯罪學對於下層階級青少年違法行爲的假設並未在我們的研究資料中得到證實。

唯一的例外是在下層階級青少年中，如果以住宅市價單一變數來看，社會資源愈多之青少年，其偷竊中等至大額財物的行爲愈爲頻繁。換言之，必須要是擁有經濟資源較多的下層階級青少年傾向於從事偷竊行爲。這樣的結論同時也顯示了各階級內部本身具有相

當大的變異性，若以線性的方式來分析青少年社會階級與其各種偏差行爲的關係，也許會使我們對這個犯罪學上古典問題的瞭解失去真實性。因此，一如我們原先的主張和假設，有關社會階級與偏差行爲的實證分析也許應該以個別的方式針對每一個階級分別進行內部的深入探討。

接下來，圖三至圖五所展示的是各隱藏變項，測量變數的關係以及自變項、依變項間的關係。首先圖圈內代表的是所謂的隱藏變項，因爲隱藏變項無法直接測量，所以以長方格內的測量指標來替代。爲了統一隱藏變項與測量指標間的單位，我們概取第一個指標作爲基準，統一定爲一的標準值。每一個隱藏變項都代表兩項指標的共變數。

圖三是上層階級家庭出身青少年的偷竊行爲模型分析結果，圖中數字顯示合法機會結構以及對處罰的態度對這一群青少年的偷竊行爲具有直接而且關鍵性的影響。最值得注意的是，擁有合法機會結構愈多的上層階級青少年，其偷竊行爲愈多。

家庭經濟資源與上層階級出身的青少年偷竊行爲間不具有直接的關係，但卻通過其他的變數（如合法機會、非法機會結構，以及對處罰的看法等）與偷竊行爲發生間接的關係。有趣的是，家庭經濟資源較少的上層階級青少年認爲父母和法院會對自己的偏差行爲進行處罰可能性不大。這項證據對我們的鼓勵甚大，因爲其支持了上層階級青少年擁有權力，不認爲偏差行爲可能遭到嚴厲處罰的後果，而往往這種想法也爲通往偏差之路打通了第一道關卡。

表二 社會階級，家庭收入，住宅市價與各變數間的皮爾森相關係數

變項指標名稱	階級與資源	總樣本	下層階級	中間階級	上層階級
父母內在控制					
Y1母親內在控制	家庭年收入	.02	-.15	.04	.10
	住宅市價	-.03	-.11	-.06	.08
	所有階級	-.04			
Y2父親內在控制	家庭年收入	.17**	.23*	.15*	.19
	住宅市價	.12**	-.12	-.07	.18
	所有階級	.07			
父母外在控制					
Y3母親外在控制	家庭年收入	-.02	.15	-.08	.05
	住宅市價	-.04	.26*	-.11	-.04
	所有階級	-.01			
Y4父親外在控制	家庭年收入	.07	.61**	.02	-.01
	住宅市價	-.04	.05	-.07	-.06
	所有階級	-.03			
合法機會結構					
Y5學校成績	家庭年收入	.12*	.17	.11	.10
	住宅市價	.10*	.50	.00	.20*
	所有階級	.02			
Y6未來展望	家庭年收入	.07	.22	.03	.11
	住宅市價	.13**	.17	.07	.16
	所有階級	.02			
非法機會結構					
Y7損友	家庭年收入	-.07	-.07	.01	-.22*
	住宅市價	-.05	-.06	-.05	-.26**
	所有階級	.04			
Y8朋友曾遭警逮捕	家庭年收入	-.02	-.16	.04	-.08
	住宅市價	-.04	.06	-.04	-.09
	所有階級	.06			
冒險性格					
Y9喜作危險事	家庭年收入	-.02	-.10	.11	-.05
	住宅市價	-.04	-.01	.05	-.13
	所有階級	-.11*			
Y10性喜冒險	家庭年收入	.01	-.03	.08	-.04
	住宅市價	.03	-.06	.02	-.04
	所有階級	-.01			
對處罰的態度					
Y11父母處罰	家庭年收入	.06	.06	.04	.12
	住宅市價	.01	-.14	.11	.02
	所有階級	.05			
Y12法院處罰	家庭年收入	-.01	.10	-.03	.05
	住宅市價	-.05	-.10	-.01	-.02
	所有階級	-.02			
偷竊行為					
Y13少於美金五元	家庭年收入	-.04	-.16	.05	-.15
	住宅市價	-.04	.01	.02	-.12
	所有階級	.07			
Y14美金五至五十元	家庭年收入	-.04	-.09	.11	-.13
	住宅市價	-.03	.26*	-.03	-.10
	所有階級	.07			
Y15美金五十元以上	家庭年收入	-.01	.06	.07	-.05
	住宅市價	.07	.33**	-.01	-.04
	所有階級	-.04			

表中* $<.05$ ，** $<.01$ 。

圖三的分析結果也顯示每一個隱藏變項與測量指標間的係數(lambda coefficient)都是顯著的,也就是說我們所設計的各指標可以準確的測量出隱藏變項的真實意義與變化。另外,來自父親的內在與外在控制變數,比來自母親的內在與外在變數間的一致性高。換言之,就出身上層階級家庭的青少年而言,父親管教態度的一致性似乎更高於母親。

圖四是有關出身中產階級青少年的偷竊行為模型分析。我們首先看到的是家庭經濟資源與其他變數之間均無統計上的顯著效果。但是當我們加入中介變數之後,家庭經濟資源和偷竊行為的關係,除了另一組增加的關係外(即非法機會結構與偷竊行為顯著的關係)。基本上與前述之上層階級模型頗為神似。尤其是父親的內在控制愈強,其外在控制也愈強,同樣的現象並未在母親身上發現。

圖五是下層階級出身之青少年的偷竊行為解釋模型。分析結果發現,家庭經濟資源與父親內在控制具有直接而且顯著的關係。這群較無權力的青少年,若再加上稍微豐富的家庭經濟資源,結果就是使其行為較無約束,絲毫不受父母內在控制的影響。和中上層階級不同的是,母親的內在控制與外在控制一致性很高。這表示下層階級家庭的母親對青少年子女的管教上,可能動之以情,同時嚴厲在後,雙管齊下地塑造子女的行為模式。很遺憾的是,在本模型中我們無法以顯著統計檢定結果來下一個肯定的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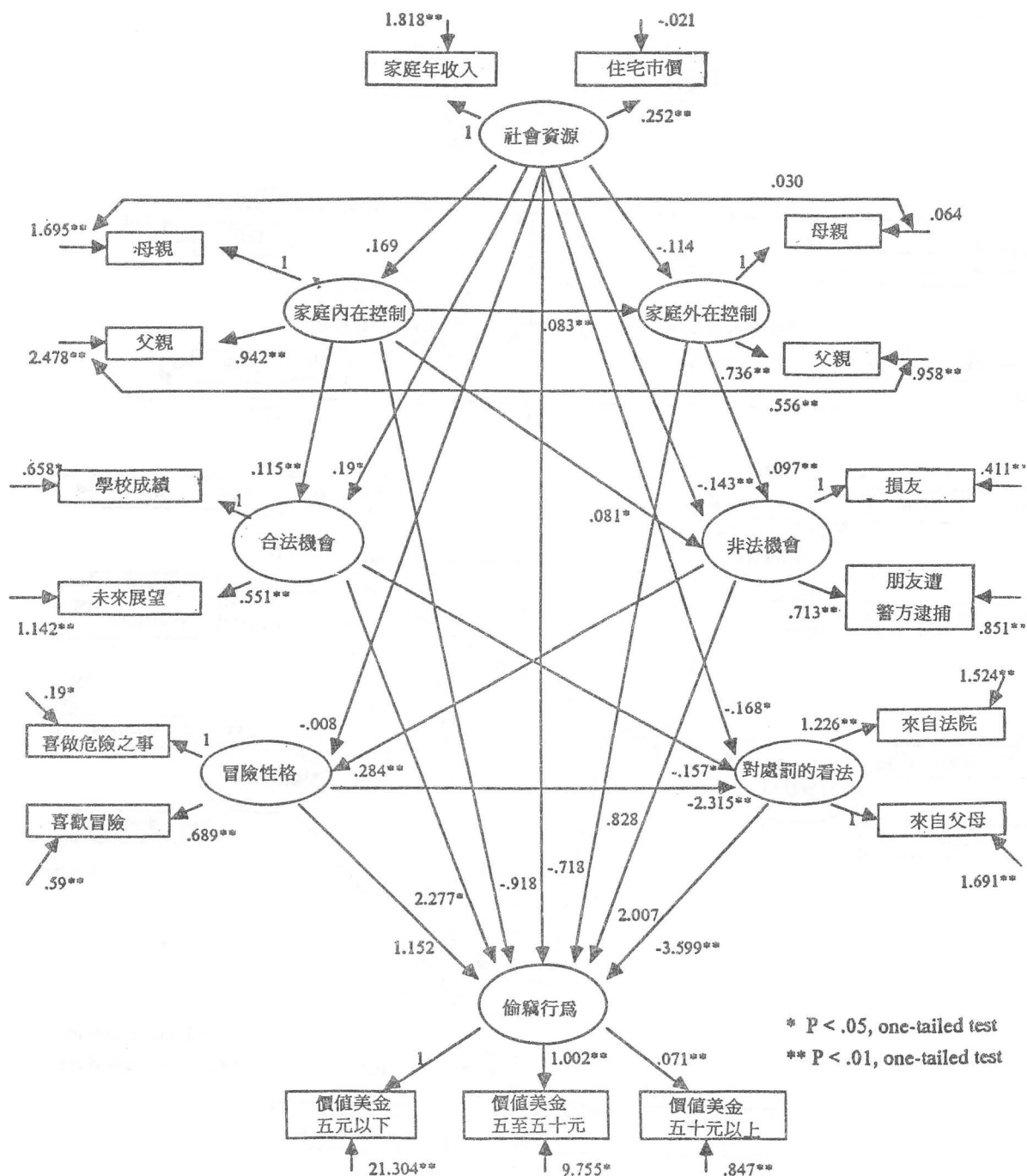
根據以上三個模型的分析結果,我們可以獲得一個初步的結論,那就是青少年的偷竊行為與其出身的社會階級似乎具有一定程

度的關係。其他有關的證據,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的以各模型的整體解釋力做一評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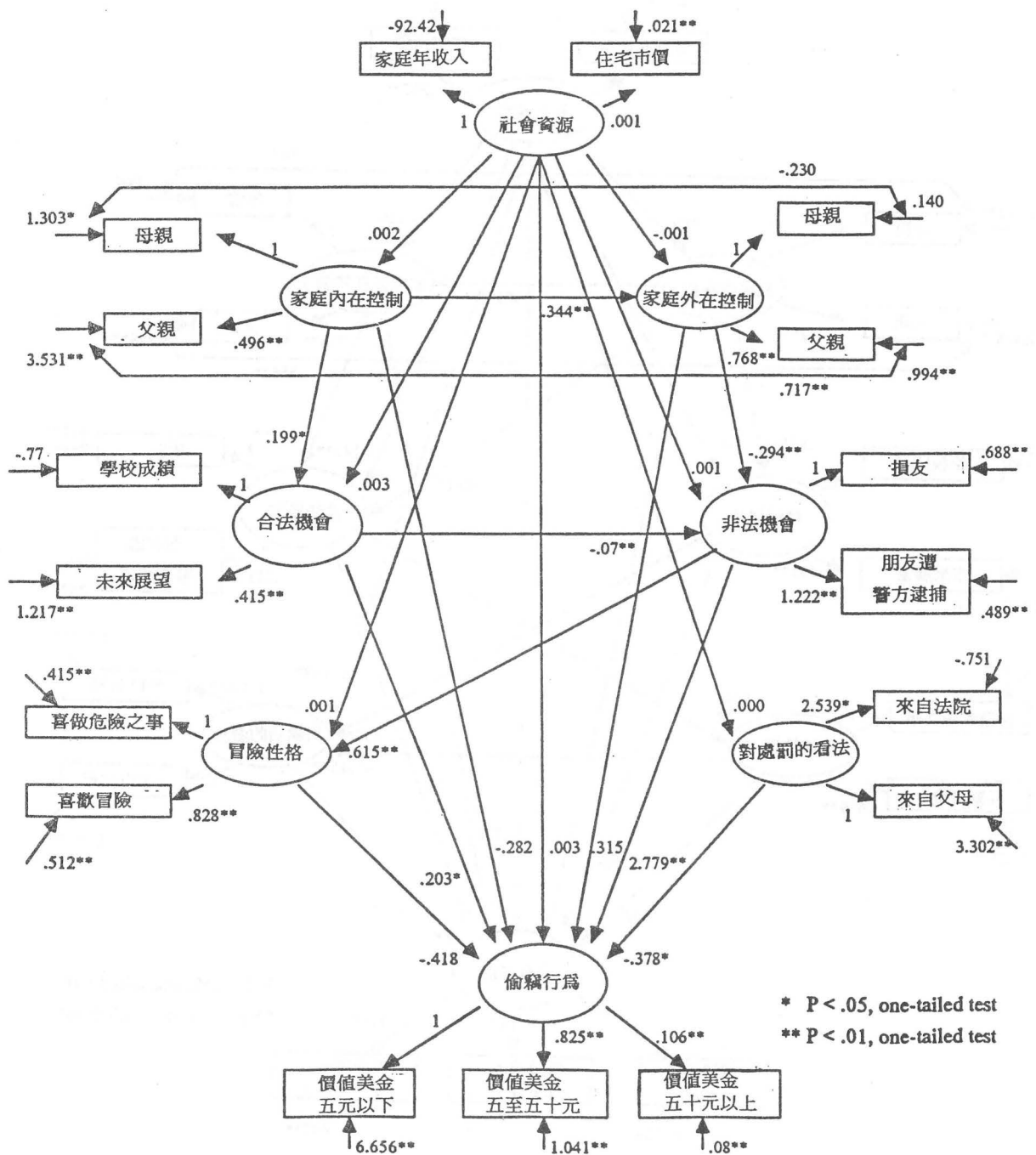
表三 各理論模型與資料的符合程度檢定值

階 級	適當性符合度	卡方檢定	自由度	顯著值
上層階級	.91	106.23	89	.103
中間階級	.94	137.60	89	.001
下層階級	.85	152.41	89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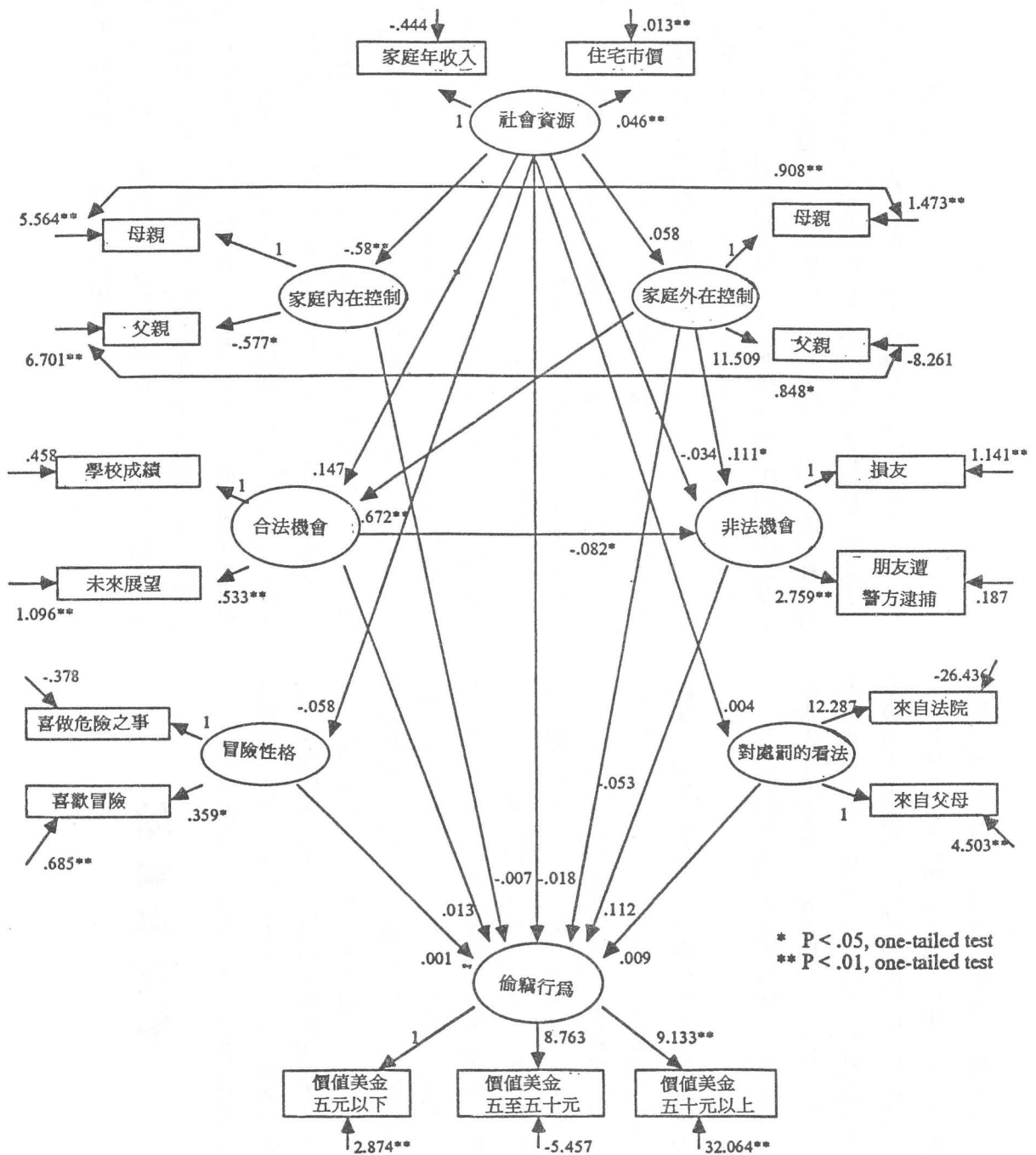
表三是青少年偷竊行為與社會階級關係各模型適當性之符合程度與卡方檢定值的一覽表。此表中的數值顯示,上層階級模型所得到卡方檢定值為106.23,自由度是89,統計顯著度是.103的水準。至於中間階級則在自由度等於89的情況下,得到了137.6的卡方檢定值,統計顯著水準是.001。以此也可類推下層階級的數字。當顯著機率是.103時,其統計上的意義表示,我們所假設的理論模型與資料本身所測量出來的共變數矩陣,兩者的符合的機率是百分之10。反之,如果機率顯示是.001,則代表兩者符合的機率是百分之0.1。所以我們可以藉之判定前者的模型較後者為準確,也是我們較可以接受的模型。因此之故,在三個模型中,上層階級青少年偷竊行為的架



圖三 出身上層階級家庭青少年之偷竊行為模型



圖四 出身中間階級家庭青少年之偷竊行為模型



圖五 出身下層階級家庭青少年之偷竊行為模型

構相對於其他階級模型而言較具信度。

有的學者對卡方檢定值以及其機率的信度表示懷疑，因為卡方檢定常常容易受其樣本數大小的影響而產生嚴重偏誤。因此，學者認為在評判模型時，也可以參考 Goodness-of-fit 的指數值作為輔助 (Bentler, 1989)。Goodness-of-fit 的指數值介於零與一之間，可以有有效的解決卡方值因樣本數增加而自然增大的問題。Goodness-of-fit 的指數值代表假設模型可以解釋的變異數與共變數的綜合相對值，通常愈接近一，表示此模型的解釋力愈佳。統計學學者 Bentler (1989) 認為一個模型若 Goodness-of-fit 的指數值高於 .90 即為一個好的模型，另外一位統計學專家 Byrne (1989) 則建議 Goodness-of-fit 指數只要 .87 即可算是一個具有解釋力，可以接受的模型、根據學者們不同的標準，我們在表三的分析結果中可以得知，中間階級以及上層階級較下層階級模型的解釋力為佳。下層階級模型的 Goodness-of-fit 指數值較為接近 Byrne 的標準，基本上解釋了百分之 85 的變異數。

不論從卡方檢定或 Goodness-of-fit 指數那一個標準來判斷，我們可以肯定的是我們的假設模型較為適用於解釋中間階級以及上層階級青少年的偷竊行為。我們的分析結果顯示，中上階級裡具有合法機會結構和青少年對處罰的態度兩者在其偷竊行為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觸媒角色。至於我們的模型在解釋下層階級青少年偷竊行為上則顯得相對薄弱許多。

結論與討論

上一節的分析結果反映了一些值得觀察與注意的事實。首先，我們發現出身上層階級家庭的青少年較容易從事金額較少的偷竊行為。下層階級青少年則喜歡偷竊金額較大的財物。

在個別的自變數對青少年偷竊行為的解釋上，我們發現對上層階級青少年而言，合法機會結構以及受冒險的性格最具有導火線功能。中產階級青少年偷竊行為方面，則以此階級之合法機會結構、非法機會結構和愛冒險性格為關鍵性因素。最後，我們發現以上的各種中介變數均無法解釋下層階級的偷竊行為。在以上的結果中，讀者應該特別注意合法機會結構皆可以正面而顯著地影響中上層階級出身之青少年的偷竊行為。這些研究發現頗為符合我們先前的假設，那就是青少年的社會階級與其偷竊行為之間有密不可分的因果關係。這樣的關係也許是直接的，也許是透過其他中介變數間接產生的。

我們的研究結果指出擁有較多的合法機會，明顯地促使中上階級青少年的偷竊行為變本加厲。同樣地，中上階級青少年對處罰的態度也比下層階級為輕忽。此外，我們也發現非法機會結構對中間階級青少年偷竊行為的誘導作用比上層以及下層階級為大。

有趣的是，有關合法機會結構與青少年偷竊行為間的正向關係和緊張理論 (strain theory) 的主張正好相反。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

擁有合法機會愈多的中上階級青少年，其偷竊行為愈為嚴重。也就是說，具有光明未來的青少年感受到比別人更多的壓力，也更需要立即性的發洩與鬆弛，當機會來臨時，同時具有刺激性與冒險性的偷竊行為便成為最方便的紓解之道。另一方面的解釋是，凡是成績好以及未來可能有出息（尤其是有經濟上的前景）的青少年，冒險且刺激性高的偷竊行為可以更進一步的肯定他們所擁有的權力。就如同許多其他類似的偏差行為一樣，從事偷竊行為對中上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少年而言，不但可以從中獲得工具性的權力感（instrumental power），其實更有情緒性權力（expressive power）滿足時的快感（Marwell, 1966）。若下層階級青少年是為了缺乏合法機會結構或財物本身的匱乏而偷竊，那麼中間階級家庭出身的青少年就是因為非法機會結構適時的出現，鋌而走險，進而選擇了偷竊這條不歸路。

在卡方檢定值所呈現出來的結果顯示，我們的理論模型與資料之間的符合程度以上層階級青少年偷竊行為模型最為理想，下層階級之模型最不理想。若以 goodness-of-fit 指數的標準來看，模型之變異數以及共變數可以聯合解釋青少年偷竊行為的效度則頗有令人滿意的結果。但無論如何從總體來看，中上階級模型的解釋力最好，其次才是下層階級模型。

本研究分析架構很仔細地體檢了青少年的偷竊行為。犯罪學理論的新秀權力控制理論加上傳統的緊張理論，兩者的結合提供了一個新的視野給青少年偏差行為研究者。這也就本研究企圖提出的

主張，以社會階級詮釋諸如偷竊行為的青少年偏差行為時，基本上其轉化的地點是在家庭之內。家庭的階級結構決定了家庭社會化的方式，更在社會結構上決定了個人所擁有的各種社會機會，這些因素養成了青少年的對冒險行為偏好態度以及可能遭到處罰態度看法之輕重不一，轉而決定了青少年偷竊行為產生機率的差異。

從研究發現顯示，偷竊行為具有危險、刺激、挑戰、自由、有趣、權力感等特性，再加上可以獲得立即的回報，綜合起來其致命的吸引力深深地引誘著中上階級青少年。如果這些出身的青少年又擁有合法機會結構，且不看重遭到處罰的可能性，那麼中上階級的青少年等於處於一種完全自由的境地，偷竊行為本身的魅力無疑註定要與這些青少年結下不解之緣。

本研究結果已經為青少年家庭階級結構與偷竊行為做了一個解釋，並專門針對中上階級青少年偷竊行為試圖建立一套綜合性的理論基礎。我們也注意到美國近年來對偷竊行為也累積了不少重要的研究成果（Klenke, 1982; Fox, 1990），這些優秀的學者認為現有的犯罪學理論對青少年偷竊行為缺乏實證上的證據支持，而且也提出一套可行的解決方案。如果學者認為將偷竊行為理論化必須建立在先行廣泛地驗證其有效性的話，那麼有相關理論以及測量方法的各種研究就應該受到額外的鼓勵。本研究提出的家庭階級結構、差別機會結構、態度取向等變項綜合了九〇年代後起之秀的權力控制理論，以及六〇年代稱霸犯罪學理論的緊張理論，又經過實證分析獲得證實，從理論的整合與實證主義精神角度衡量之，不但與學

者的呼籲相互呼應，且對中上階級青少年偷竊行爲的解釋力與預測力具有一定程度的意義。

(本文作者現任台北市立師範學院社教系副教授)

參考書目

- Abelson, E. 1989. When Ladies Go A-Thieving: Middle Class Shoplifters in the Victorian Department Store.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entler, p. 1989 EQS: Structural Equations Program Manual. LA, CA: BMDP Statistical Software.
- Byrne, B. 1989 A Primer of LISREL: Basic Applications and Programming for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tic Models. NY: Springer-Verlag.
- Bonger, W. 1969 Criminality and Economic Condi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 Cameron, M. 1964 The Booster and the Snitch. NY: Glencoe.
- Chambliss, W. 1975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rime," Theory and Society 2: 166-7.
- Cloward, R. and L. Ohlin. 1960 Delinquency and Opportunity. NY: Glencoe.
- Deng, X. and S. Jou. 1990 "Cohort Effects on Gender Difference

of Shoplifting Behavior," Paper Presented at annual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eetings, 1991.

Fox, D., A. Fox, and G. Moschis. 1990 "When Consumer Behavior Goes Bad: An Investigation of Adolescent Shoplift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7(2): 149-159.

Griffin, R. 1978 Shoplifting-A twenty-year review 1966-1977, Fifteenth Annual Survey. Van Nuys, CA: Commercial Service systems.

Hagan, J., A. Gills and J. Simpson. 1988 Structural Crimin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Hagan, J. and F. Kay. 1990 "Gender and Delinquency in White-Collar Families: A Power-Control Perspective," Crime and Delinquency 36(3):391-407.

Hagan, J., A. Gillis and J. Simpson. 1985 "The Class Structure of Gender and Delinquency: Toward a Power-Control Theory of Common Delinquent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0:1151-78.

Katz, J. 1990 Seduction of Crime: Moral and Sensual Attractions in Doing Evil. NY: Basics.

Klemke, L. 1982 "Exploring Juvenile Shoplifting,"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67:59-75.

Marwell, G. 1966 "Adolescent Powerlessness and Delinquent Behavior," Social Problem 14:35-47.

Matza, D. and G. Sykes. 1961 "Juvenile Delinquency and Subterranean Valu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712-17.

Richard, M. 1980 "Alienation and Deviance: Strain Theory Reconsider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980 annual meeting for 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social Problem.

Shave, P. 1978 Shoplifting in the State of Washington: The Crime and Its Prevention. Seattle: Washington Crime Watch, Attorney General's Office.

Singer, S, M. Levine and S. Jou. 1991 Amherst Youth Boards Needs Assessment Reports: Part I. Buffalo, NY: Research Center for Children and Youth, SUNY at Buffalo .

Sorokin, P. and W. Lunden. 1959 Power and Morality. Boston, MA: Sargent.

◎台北市青少年醫療保健暨毒藥物癮醫療諮詢及門診

榮民總醫院毒藥物諮詢

地址：台北市石牌路二段二〇一號

電話：八七五—七五二五

市立療養院藥物成癮防治科

地址：台北市松德路三〇九號

電話：七二八—五七九一

晨曦福音戒毒中心

地址：台北縣永和市保福路二段三巷三七號

電話：九二七—〇〇一〇・九二七—二二八三

榮民總醫院青少年心理衛生門診

地址：台北市石牌路二段二〇一號第二門診部大樓二樓

電話：八七一—二二五一

婦幼醫院青少年醫療保健門診及諮詢

地址：台北市福州街一二號

電話：三九四—一六一七

忠孝醫院青少年醫療保健門診

地址：台北市同德路八七號

電話：七八六—二二八八

中華民國婦幼衛生協會青少年保健門診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五段一六四號二樓

電話：七八八—二二三五